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材系列

《中国文学通史》之四

明清文学史

戚世雋

董上德

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明清文学史

戚世隽 编著
董上德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文学史/戚世隽, 董上德编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1

ISBN 7-306-01306-8

I. 明… II. ①戚… ②董… III. ①文学史—中国—古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I 209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英德人民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9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全 4 册 68.00 元)

目 录

上编 明代文学史

3 概说

13 第一章 明代的诗文创作

- 14 第一节 明前期诗文
- 19 第二节 明中期诗文
- 27 第三节 明后期诗文
- 37 第四节 明代的散曲和民歌

45 第二章 《三国演义》

- 45 第一节 章回小说的产生
- 46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和版本
- 49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 53 第四节 《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 58 第五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
- 60 第六节 《三国演义》的影响

63 第三章 《水浒传》

- 63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 66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 72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77	第四节	《水浒传》的金批本
84	第五节	《水浒传》的影响
87	第四章	明代的戏剧
87	第一节	明代的杂剧
92	第二节	明代的传奇
97	第五章	汤显祖
97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和思想
98	第二节	《牡丹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104	第三节	汤显祖的其他剧作
107	第六章	《西游记》
107	第一节	《西游记》的作者和成书过程
111	第二节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120	第三节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
124	第七章	《金瓶梅》和明代中后期其他长篇小说
124	第一节	《金瓶梅》的作者和版本
127	第二节	《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137	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其他长篇小说
142	第八章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
142	第一节	白话短篇小说的形成和主要作者
145	第二节	“三言”、“二拍”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

下编 清代文学史

159 概说

168 第一章 清初至清中叶的诗、文、词、散曲

168 第一节 诗歌

179 第二节 散文

184 第三节 词与词学

189 第四节 散曲

193 第二章 洪昇和《长生殿》

193 第一节 洪昇的生平和作品

195 第二节 《长生殿》故事的继承和发展

196 第三节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204 第三章 孔尚任和《桃花扇》

204 第一节 孔尚任的生平和作品

206 第二节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214 第四章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214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和作品

217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221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225 第四节 《聊斋志异》以后的文言短篇小说

228 第五章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228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

229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234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238	第六章 《红楼梦》	
238	第一节	《红楼梦》的产生及其作者
241	第二节	《红楼梦》中的贾府
251	第三节	《红楼梦》的主要人物
265	第四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270	主要参考书目	
275	推荐阅读基本书目	
279	后记	

上 编
明代文学史

概 说

明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它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恢复并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进入了晚期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内，中世纪的欧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与中国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也融入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些与以前历代王朝不同的境遇，促成明代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的时代风貌。

明代文学，从总体来说，具有以下特点：1. 各种文体具备，并达到了成熟。通俗文学——小说、戏曲创作勃兴，形成空前繁荣局面，代表明代文学最高成就。2. 整个明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嘉靖元年（1522）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明之际动荡的时代生活，唤起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促使文学发生变革。之后，是长达百余年的文学低潮，直到嘉靖、万历以后，明代的文学才迎来了又一次高潮，大众化的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逐渐取代了以士大夫为主要欣赏对象的传统诗词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放异彩的篇章。

元代末年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造成军阀混战与群雄割据的局面，从北方红军分化出来的朱元璋，取龙盘虎踞的金陵为基地，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方针，在削平了南方割据势力之后，1368年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

元明之际的时代风云，把一大批封建文人也卷入其中。浙东著名的地主文人刘基、宋濂等应朱元璋之聘来到应天，成为朱元璋的谋士。小说家罗贯中，虽然不一定是“有志图王者”（明·王圻《稗史汇编》），但也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有抱负并有一定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些文人开始思考社会与人生的一系列问题，探求社会变动的原因，寻找由乱而治的良方。由于许多作家都曾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对社会有深刻的观察与体验，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大动荡时代广阔的现实生活，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罗贯中、施耐庵则以丰富的生活知识和斗争经验，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杂剧刊行的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并给后来的文学创作以深切影响，以后又相继产生了不少以它们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戏曲、民间文艺。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不久，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低潮时期，这与明初统治者采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明太祖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父母和长兄都在瘟疫中相继死去，他不得不以云游乞食为生，这一方面使他进一步了解到民间的痛苦，社会的弊病，扩大了视野，另一方面，不安定的生活境况，又使他沾染了游民习气，善于结交社会各阶层人物，刚愎自用，猜忌心重。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首先推行了一系列重建统治秩序的措施。

明太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皇权政治。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以“擅权枉法”之罪处死丞相胡惟庸，接着，下令废除中书省丞相制度，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位，分任朝政，直接由皇帝指挥，趁机废除大都督府，设中、

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其职权与兵部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每逢战时，由皇帝作出决定，兵部颁发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将统兵。这样，皇帝实际上已把军政大权揽于一身。

明朝初创，一部分地主文人不肯合作，加深了明太祖对士大夫的厌恶和猜忌。明太祖屡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酿成许多冤案。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允亮替海门卫官作的《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北平府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太祖均以“则”字和“贼”字谐音，是影射他当过红军，一概处死。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认为“道”是“盗”，“则”是“贼”，“光”是“光头”，“生”是“僧”，“青门”是和尚庙，讽刺他当过盗贼，做过和尚，也一概处死。陷入文字狱的文人、官员，原是献媚、颂扬太祖和明朝的，却无意中触犯了忌讳，招来惨祸。明太祖以文字为借口，用高压的手段对付他们，意在箝制社会舆论，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淫威，扼杀异己思想的萌发。

明朝“以理学开国”，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明成祖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派理学是支配文人的主导思想。在积极提倡理学的同时，还把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专从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朱注解释，其形式亦有严格规定，那些整天钻研“高头讲章”，揣摩八股时文的读书人，不仅对于天下大事、国民生计茫然无绪，就是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也是知之不多。

明初从洪武到弘治 100 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由恢复进而发展，但在思想和文化的专制统治下，文学创作却几乎没有出现

较有成就的作品。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成为诗坛的主流。“三杨”的诗作，充满着阿谀逢迎、粉饰太平的词句，呆板平庸，有气无力。由于他们都是显赫一时的数朝元老、台阁重臣，致使很多文人、士大夫追随、模仿，先后流行达百年之久。

在剧坛上，充斥着大量点缀升平和宣传封建道德伦理的作品。宗室朱有燬擅名一时的《诚斋乐府》，内容多是神仙庆寿、美人赏花之类。丘濬的《五伦全备记》，虚构了伍伦全、伍伦备兄弟和他一家的遭遇，表现了剧中人物怎样死心塌地按照忠君、孝悌、贞节的封建教条行事。丘濬在剧中写道：“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这样的说教古板沉闷，几乎丧失了文学和艺术。

章回小说的创作是一片空白，一些文人学士对明初小说进行纂辑加工，如弘治年间，福建闽县人林翰据原本（署名罗贯中）纂辑《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浙江金华人蒋大器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为这些名著的刊刻流行打下了基础。

明代到了中叶弘治、正德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朝政越来越腐败。正德时的武宗就是个纵欲逸乐的皇帝，政事为宦官刘瑾等所操纵。他们利用武宗荒嬉好逸乐的特点，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供其玩乐，以博得武宗的欢心，同时趁机掌握军政大权，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力量。朝政落入佞幸掌握之中，官吏贪污和贿赂的现象日趋严重，封建王朝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日益扩大。皇室地主、贵族地主和官僚地主凭藉着政治和经济特

权，带头掀起土地兼并的狂潮，而繁重的赋役，又使不胜重负的农民走向流亡。人民流亡成为全国性的严重问题。明中叶不少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民，也带动了迁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变化，为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明中叶社会的变迁，使一部分学者文人感受到程朱理学的困境和压抑，起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

弘治、正德时期，浙江余姚人王守仁开创了姚江之学，王守仁字伯安，因筑室学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主张人心是宇宙的本体，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作是由心产生出来的，从这一世界观出发，他又提出“致良知”的观点，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答陆原静书》），他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答顾东桥书》）。他认为“良知”乃是人人具有的，“不待学而能，不待虑而得”（《书朱守乾卷》）的天赋本性。有些人“良知”不显露，是由于受到“私欲”蒙蔽的缘故，而要除掉人的“私欲”，恢复“本心”，就必须有“致良知”的工夫。不可否认，王阳明心学的最终指向，仍着眼封建政治统治的稳固；在他看来，要治理当时的社会，只有在他的“心学”的指导下，通过“正心”、“诚意”，加强封建的道德修养，“去人欲，存天理”，才能平息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才能对付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丁丑）》）的问题。但是，王阳明所强调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相比，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姿态，对明代中后期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一切从“吾心”出发，以“吾心”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冲击了长期被朱熹思想所控制的局面，起到了活跃学术空气，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他的尊重个人思考的权威性，承认良知人人皆有，“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答顾东桥书》），与后来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潮，也有着很深的相承关系。

嘉靖、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一个高潮。从明代中叶起，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增多，商人的人数比以往有成倍的增长，还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商人集团，如实力最雄厚、财富称雄天下的徽州、山西商人，以海商闻名天下的闽、粤商人，以布商雄踞一方的江苏洞庭商人等等，这大大小小商人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各地的商品流通，繁荣了市场经济，对于中国传统的封闭性经济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嘉靖、万历时期的手工业，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经营方式，都有显著的进步。在改善经营方式方面，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有些部门，如纺织业、矿冶业、榨油业以及制盐业、造纸业、制瓷业等正在逐渐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工场的生产。比如当时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就有记载，丝织业主们为了市场而生产，佣工缺乏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各有专门的技术，其生产过程有相当明确的分工。这种为市场需求而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业生产，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所产生的，具有进步的意义。

嘉靖、万历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特别是私人海上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日本、吕宋、暹罗（泰国），他们把内地的丝织品、瓷器、白糖以及各种日用珍玩运销海外，换取胡椒、香料等回国出售。中国的商品被运往欧洲及美洲，引发了东方热。

嘉靖、万历时期，社会风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商品和货币的诱惑，社会各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逐利拜金的风气，钱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了崇拜的对象，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奢侈浮华之风也非常盛行，请客宴乐，讲求排场，宴席的规格越来越高，不惜一掷千金，满足一时的享乐。何良俊记录自己的亲身闻见说：“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

品，以求相胜。”（《四友斋丛说》）民间冠裳服饰也愈趋浮华，在富庶的江南，如张瀚所述：“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今男子服锦绣，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松窗梦语》）

逐利和奢侈之风的盛行，反映嘉靖、万历时期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和奢侈消费，本来只是上层官僚贵族和大地主们的专利，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无积极意义可言，但它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和挑战。

明中叶风靡一时的王学在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去世后，产生了激烈的变化，分化为许多门派，其中以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发展了王学的积极因素，把王阳明主张独立思考的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王艮是泰州人，出身于灶户平民家庭，早年曾经商，后师从心学大师王阳明。王阳明去世后，他回到家乡泰州讲学，自立门户，形成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之道”的观点，他认为，“百姓日用”才是“道”的核心，也是“道”的标准，“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语录》）。肯定饥食享用、男女之性是“自然天则”（《语录》），认为人欲就是天理，与“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相对立。提出只有“安身立本”，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答问补遗》），所谓“安身立本”，首先是要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需要，其次是要维护人的尊严。

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嘉靖、万历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派学者都是主张百姓与圣贤并无根本区别，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的物质欲望，驳斥道学的禁欲主义，大胆怀疑经传，强调独立思考精神。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称他们是“坐在利欲胶漆盆中”。

在泰州学派离经叛道的浪潮中，福建李贽异军突起。李贽是

泉州府晋江县人，中年时曾与泰州学派诸人频频交往。随着嘉靖、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他的思想在泰州学派反传统的基础上，又大大进了一步，成了当时最激进的叛逆思想家。李贽敢于对正统的儒教提出挑战。他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对儒家经典抱着轻蔑态度，他宣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要按照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评价圣人的言行以及其他古今人物和历史是非。关于儒家所标榜的“道”，他也认为“道”仅仅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而已。因此，他对传统的人生哲学提出挑战，认为只有自私心才是人类的天性，主张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欲望应当得到应有的满足，主张一切顺其个性而行，不必吞吞吐吐、躲躲藏藏。

这些主张抒发自然情感和纵欲主义的人生观，在当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它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和伦理观，冲击着明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对以后的思想文化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末某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他的影响，如当时著名的文学流派“公安派”创始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他们的思想情趣，都直接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明末又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汤显祖，也十分推重李贽的为人和学问，他曾多次公开表示极心服李贽，他的以情反理的人生主张，也是提倡维护人的本性真理。

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对台阁体粉饰现实的老调，越来越不满，他们以“诗必汉魏盛唐”的复古主张，掀起了文学复古运动，以此反对台阁体的空泛、华靡的文风，在当时影响很大。

嘉靖年间，继“前七子”的余绪，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再度兴起，进而把文学复古运动推向一个高潮，他们发挥前七子的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王世贞《艺苑卮言》），结社宣传，互相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极盛，从而彻底摧